

# 大湖西 (连载)

杨义堂



随着义勇队二总队迅速发展,游击队规模扩大,人员越来越多,吃穿用度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大队长李贞乾、政委郭影秋对各大队都严格要求,不准像土匪一样出去抢劫,即使生活再困难也不能去抢劫!特别是政委郭影秋,他不仅在二总队的总部这样讲,还到各大队去检查,决不允许有土匪“绑票”的事情发生,这让一些土匪出身的人感到很不自在。一些人就发牢骚,说“在义勇队当兵可真不容易啊!”“如果不是郭政委这样严格,凭着咱们抗日的影响力,义勇队在短短几个月内,或许就能发展成为拥有几万人的抗日大军。”

不久,从湖西各县逃到外地的国民党县政府人员又先后回来了。得知国民党丰县政府秘书、常备队长黄体润已经回来的消息,李贞乾觉得应该请黄体润出山,恢复国民党丰县政府。

黄体润,字玉山,1896年出生,中等身材,脸黑乎乎的,两道浓密的吊梢眉下,眼睛不停地眨着,显得思路很缜密,嘴巴像是在使劲抿着,显得做事很决断。在上学时,黄体润给李贞乾起外号“小火车头”,李贞乾给黄体润起外号“吊睛猛虎”,一是由于黄体润眼角和眉毛下垂,看谁都好像不顺眼,二是他性格凶狠,做事果断,不服输。

黄体润是县府秘书,县长董玉珏只是个甩手掌柜,什么事都是黄体润这个“二县长”操办。黄体润敬慕晚清名臣曾国藩,最爱看《曾文正公全集》,做事很有章法,也很有威望。他学着曾国藩记日记,每天都要记录下自己的工作生活。对李贞乾的想法,王文彬也没有反对,郭影秋本想反对支援黄体润重新组建丰县国民党政府,但在统一战线期间,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反对理由,只好作罢。于是,李贞乾派自己的学生、丰县中学毕业的王效斌去做黄体润的工作。

黄体润回到丰县后,看到被日军糟蹋得不成样子的县政府大院,又听到共产党已经组建了抗日武装,他感到很失落。自从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西撤,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也撤往苏南,他也不知道下一步

怎么办。看到李贞乾派王效斌来访,听说共产党要帮他恢复县政府,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他立即带着几包茶叶,骑着脚踏车,跟着王效斌来到李新庄,拜会共产党干部王文彬和李贞乾。

李贞乾家院子里的大椿树上蝉声嘶鸣,大树下,王文彬和李贞乾一起接见了黄体润。

外号叫“吊睛猛虎”的黄体润说话时,两道浓密的吊梢眉下,眼睛不停地眨巴着,他赞扬共产党在日寇侵犯时坚决不退,反而带领百姓抗战,他对此十分钦佩,特别感谢共产党不计前嫌,从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帮助国民党恢复县政府。

王文彬和李贞乾都希望黄体润当县长,组建丰县常备队,担当起统一战线的主力作用。而共产党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发展遇到了新问题,钱粮筹措很困难,如果新的县政府成立,政府应该帮着二总队筹集钱粮。

黄体润说,共产党带领人民抗战,功劳第一,重视国共合作,帮助国民党恢复政府,意义重大,以后有用着兄弟的地方,一定竭尽全力!可是,自己过去只是县政府的秘书,当县长勉为其难。听说县长董玉珏向南到安徽阜阳避难,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自己可以当代理县长兼常备队队长,把丰县常备队先恢复起来。

王文彬和李贞乾同意了他的说法,派王效斌等人去协助他组织临时县政府,由黄体润任代理县长,并帮他收拢打散的丰县常备队。丰县常备队一下子拉起了500多人,下设四个大队。

日寇占领沛县后,驻徐州日军带领汉奸金啸虎“扫荡”沛县,沛县国民党地方游击队全部被冲垮,冯子固只带着一名警卫员惊魂未定地回到了沛县杨屯镇孔庄的老家。当时,中共沛县县委书记郝中士带领苗宗藩等在沛县西北大沙河东岸一带活动,既动员组织群众成立自卫队保家卫国,又动员藏枪隐蔽的国民党地方游击队队员,重新拿起武器打击日军。中共苏鲁豫特委派共产党员陈筹去找冯子固。(未完待续)

荐书堂



主办单位: 济宁晚报 济宁亚龙书城



## 散文集《七龙河上》 描绘新时代乡村画卷

散文家孟晓峰作品《七龙河上》由山东省散文学会出版策划中心编辑策划,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是作者围绕七龙河这一村庄创作的系列随笔作品,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感受,深入挖掘村庄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感受乡村振兴中乡村的发展变迁,展示了作家所感知的乡村文化振兴,勾勒了一幅生动、火热的新时代乡村画卷。作者以朴实的语言、纪实的风格和非虚构的创作手法为读者书写了不一样的村庄故事。既是践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真实实践,也是一部基层作者用文字和情感融合的精神读本。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掌故知鲁

## 曲阜碑刻(八十二) 明正德四年 重修颜庙落成记碑

张镛毅

在曲阜颜庙中院西碑亭,一通规整的碑刻静静矗立。它以详实的文字记录了明代重修颜庙的全过程,承载着朝廷尊儒、家族传承、礼制践行的多重历史信息,这便是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重修颜庙落成记碑。作为见证明代中期尊崇颜子、传承儒道的重要“石质档案”,此碑不仅是研究颜庙沿革与颜氏家族地位的第一手史料,更折射出正德初年的政治文化生态与儒家祭祀体系的成熟,其蕴含的历史意义值得深入拆解。

这通碑刻立于明武宗正德四年七月,为青石质地,整体规制典雅庄重:石碑通高2.08米,其中碑头高0.65米,雕刻云纹装饰,正中有楷书“大明重修复圣公庙落成记”十一字;碑身宽0.98米、厚0.28米、碑座高0.19米,周身饰有花边。碑身上刻有楷体碑文,共21行,每行52字,由赐进士中宪大夫、福建按察司提学副使、前翰林院庶吉士、东沂人陈玉撰文,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颜公铨立石。历经五百余年风雨,碑刻字迹基本清晰,仅少数边角略有磨损,是曲阜明代碑刻中保存较好的珍品。

这通碑刻的诞生,源于颜庙“日久倾圮”的现实困境。颜庙作为复圣颜子的祭祀场所,自唐以来便是儒家圣地,虽也屡经修缮,但至明代正德初年已破败不堪,无法承载祭祀功能。于是颜氏大宗子、颜子六十一代孙、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颜公铨便牵头颜庙重修工程。重修工程始于正德二年六月,至正德四年七月正式落成,历时两年有余。工程竣工后,颜公铨“上请圣制碑文一通,以示崇重”,但考虑到“鸠工岁月,雇募之经费,教课之名职,出给入籍,

细碎繁复”,不便烦扰皇帝御笔,遂委托陈玉撰写碑文,“纪一时制度之盛”,这通落成记碑由此应运而生,成为此次重修工程的永久见证。

碑文内容围绕“尊崇颜子、传承道统”展开,彰显了颜子之道的永恒价值,是明代儒家思想的集中表达。碑文开篇即定调,“圣贤之道在天下,德泽在人心,固天下之所以极其尊崇,愈远而不可泯者”,明确颜子与孔子并称“先师”,自唐已然。针对“豆籩之丰洁,有加于簞瓢之食;宫宇之焕赫,有过于陋巷之居”的片面质疑,碑文驳斥道:“是皆末之论,不足与议尊崇之义也。”碑文强调颜子的核心价值在于“传吾道之心法者,乃克复之学;阐礼乐之治化者,乃为邦之论”,其道统传承无关外在形式,关键在“德泽在人心”的精神影响。碑文还记述了颜氏家族的兴盛,“颜族丽于闾里者,代有闻人”,至明代“涵泳圣涯者,日益加盛”。这种传承并非单纯血脉

延续,更在于对颜子之道的践行,而朝廷恩宠则为这份传承提供了坚实保障,凸显了颜庙“非徒配享孔庭,更以教化天下”的公共价值。

这通碑刻的意义绝非单纯的工程纪念,其背后蕴含着明代成熟的礼制体系与正德初年的社会治理逻辑。明代形成的儒家先贤祭祀格局是:孔子为至圣,颜子为复圣,颜庙与孔庙同属国祭范畴,但颜庙的祭祀规格比孔庙低,构成“主从分明、相辅相成”的体系。颜氏世袭五经博士的设置,将“家祭”与“国祭”有机结合,确保了祭祀的连续性与规范性。

此次重修立碑,正是通过完善祭祀场所,来强化颜子尊崇地位,巩固儒家道统,践行“以礼化民”的治理目标。

正德四年处于明武宗执政初期,承接“弘治中兴”之后,虽然朝政渐趋松动,但尊儒政策仍得以延续。当时的社会面临多重挑战:宦官势力初露端倪,土地兼并有所抬头,地方治理压力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朝廷与地方通过重修颜庙、立碑颂圣,试图借助颜子“克复之学”“仁义之道”的教化力量,凝聚社会共识,化解潜在危机。

历经五个世纪的岁月流转,明正德四年重修颜庙落成记碑依然矗立在颜庙之中。它记录了颜庙重修工程的始末,以文字彰显儒家道统,更以碑刻本身见证了儒家文化在古代社会的绵延不绝。当我们驻足碑前,逐字品读那些端庄的楷书,仿佛能触摸到正德初年的儒风雅韵,感受到朝廷与士人“以儒化民、以道安邦”的政治智慧。